

□ 陈启清

201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上升到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的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成就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鲜明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稳中求进始终是党和政府坚持的经济工作总基调。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全局，突出重点，扎扎实实开好局”。2013、2014、201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下一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时，每年都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始终把握稳定的大方向，实现了经济增长稳、就业岗位稳、社会发展稳，实现了结构改善有进、动力转换有进、体制改革有进、民生改善有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也赢得了民心。

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面对压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5870美元，2015年增加到约7880美元，年均增速达到10.3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是经济增量每年都在增加，每年新增就业岗位都突破年初预计，2016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67万人，提前一

“稳中求进”如何稳，怎么进？

个季度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实现了就业和社会稳定。2016年前三季度，居民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保障房建设领域等方面财政支出普遍增长在14%以上，远高于经济增速。中央尤其重视扶贫工作，2011年至2015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亿多人，贫困发生率降低11.5个百分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党中央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经受了实践检验，是符合实际的。也正是基于十八大以来的探索和成功实践，中央在2016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把稳中求进作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的经济工作思想方法。

2017年稳中求进如何稳？

“贯彻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这些重大工作的完成都离不开稳定的大局，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环境。各项工作都要维护好稳这个大局，有利于稳的事多做，有利于稳的改革多推进。

2017年稳的要求体现在几个方

面：一是宏观政策要稳。宏观政策要稳已经成为新常态经济政策框架重要的组成部分，政策稳定对于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十分重要。货币政策将致力于维护流动性的基本稳定，保持政策中性。财政政策将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政策将致力于提升有效性，预计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方面将有进一步实质性进展。二是汇率要稳。中国拥有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增速、全球第二大经济规模、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人民币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拥有坚实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政策目标致力于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针对的是人民币汇率指数，而不是人民币对某一货币的汇率。三是金融要稳。金融风险防控将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一些金融风险点将被定点清除。四是预期要稳。预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直线下跌背后就有预期不稳的影响。要通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扩大开放来稳定社会信心。同时也要更加重视预期引导，重视加强和市场沟通来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五是社会要稳。经济下行和改革深化有可能给一部分群众造成利益损失，因此2017年要更加重视社会保障网的托底。

2017年经济稳面临哪些风险？其中三类风险要格外关注：一是汇率风险。目前虽然基本本面不支持人民币汇率贬值，但是一方面市场内外形成了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强大预期；另一方

面美元指数走强和美元加息加大了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压力，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加大。但汇率波动只是表象，对一国经济真正带来伤害的是汇率波动背后的资本和商品的流动，历史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倒在汇率贬值和资本外流的漩涡中的。因此，防范汇率风险要更加重视汇率波动引发的资本外流风险，要把工作做到管控非正常资本外流上。二是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收益率持续下行，大量资金在金融领域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系统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同时一些新兴金融形态在现有的监管体系中也忽视，造成了新的风险点。因此必须对金融系统进行全面排查，清除可能的隐患。同时尽快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三是资产价格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货币增速在大多数年份保持着高于名义GDP的增速，1991—2015年25年间，M2平均增速19.77%，名义GDP平均增速15.44%，两者相差4.33个百分点。货币多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就会去寻找新的购买对象，货币冲到哪里，哪里价格就可能上涨。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各类资产轮动上涨的局面，但历史反复证明的一个事实是资产价格不可能永远上涨，资产价格也不可能涨到天上去，资产价格一旦下跌，就可能酿成经济和金融风险，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必须提前预防此种风险，切实把过快上涨的价格控制下来。

2017年稳中求进怎么进？

稳不是不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进就要在关键领域着力，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7年经济工作的主线，必须有实质性进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进一步论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会议也部署了2017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任务：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前两项是具有延续性的工作，后两项是此次会议特别提出的。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一国经济的脊梁，必须发展好。振兴实体经济除了从实体经济本身着手，还必须给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认为当前造成社会资金大量从实体经济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8.5%，超过当今世界金融最发达的两个经济体——英国和美国的7.2%。2011年，金融企业所得税是工业企业所得税的56%，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15%。这些数字意味着我国金融可

能过度繁荣了，金融的过度繁荣像一个庞大的黑洞一样吸引着资金从实体经济退出进入金融领域，吸引着人才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领域，大量市场主体不再执着制造，开始追求金融交易、资产交易的利润。只有改变这一现象，振兴实体经济的各项政策才有可能起到实质性作用。

房地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即使在美国，房地产对其经济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必须着眼于长远规划房地产业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非常正确。从住房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来看，住房很容易就成为金融资源介入并推波助澜炒作价格的对象，但也正因为金融资源的介入，一旦住房价格下跌，就可能在金融系统造成大量不良资产并进而导致金融系统危机。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必须要规避此种风险，一方面要严格控制非居住需求，要严格控制房地产杠杆；另一方面要增加供给，尤其顺应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改变供给结构，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只要把住稳的大局，坚持进的方向，中国经济前景必然光明。之所以作出此种判断，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我们在供给侧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等方面拥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走在正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道路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有问题，关键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基本上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高速发展的。未来仍将如此。

经济时评

坚定农业发展的绿色化方向

□ 刘丽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目标是推动供需匹配，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和质量监管。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绿色化是农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融入了保护环境、崇尚自然、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我国，绿色农产品及其发展战略是由农业部于1989年首次提出并于1990年正式实施的。现阶段，我国大多数涉农农业生产规模小，专业化、集约化程度不高，科技含量低；有机蔬菜种植面积为90余万亩，占蔬菜总种植面积0.3%左右，远远低于国际1.7%-1.3%的水平；有机蔬菜产量205万吨，占全国蔬菜总产量0.27%。伴随我国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过渡进程的加快，中产阶层群体规模的扩大，生存型消费转为发展型消费，农产品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高品质农产品供不应求，中低档农产品供大于求。绿色农产品供给难以满足新常态下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供需结构失衡对农业绿色发展的迫切要求。结构性产能过剩造成的供需失衡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典型特征。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绿色路径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夯实绿色农产品供给侧基础。近年来，农民老龄化、兼业化及低学历现象仍然存在，但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发展起来，正成为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目前，专业大户超过68万户，家庭农场达到87.7万个，专业合作社超过153万家，龙头企业约12万家；同时，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及农

技术人员等返乡下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570余万，职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上述农业经营主体拥有一定知识水平和业务水平，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行绿色生产的主力军。2014年以来，国务院出台若干政策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16公布的《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支持方式和具体政策。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还应加快环境教育立法，加强宣传，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绿色思想意识，转变其面对经济利益和食品安全双重选择时偏好于经济利益的狭隘思想，使之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提高参与绿色生产自觉性；积极发展农业科技应用教育，加强绿色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培训，提高生产者科技素质及运用绿色科技致富的能力。

加强技术创新，以绿色产能的增长接替边际产能的退出，提升绿色农产品供给侧质量。农业绿色转型的实质是用农业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等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使技术创新嵌入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各环节并提升全产业链的绿色安全度。因此，要加强生物防治病、虫、草害技术及新型肥料和农药的研发，力求化肥和农药低毒、低残留、高效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要加强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发，实现循环型、清洁化的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通过测土配方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全面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绿色产能的增长接替边际产能的退出；同时，要积极利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发展“智慧型”绿色农业。充分利用农业物联网技术以实现农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全生产流程的数据共享及智能决策，从而促进生产要素配置合理化、大幅提升绿色农产品供给侧质量。

优化供应链模式，提高绿色农产品供给侧效率。我国生鲜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尚未形成区域性及全国性的产供销一体化绿色农产品物流体系，供应链技术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在供应链环节中的产品损耗高达12%-30%。物联网时

代背景下，我国亟需加强绿色智能农产品供应链的构建与管理。政府部门在鼓励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绿色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生产、提高市场需求信息透明度、建立产销对接的同时，还要加强绿色智能农产品供应链核心技术的研发，零化各环节的库存积压，降低物流运作的有形耗损。当前的迫切需要是构建基于物流中心的效率型绿色农产品供应链。此模式通过第三方物流企业整合供应链系统，把企业的农产品集中到配送中心，然后统一配送到供应链的各环节企业，从而有效节约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时间及运作成本。

创建品牌，建设可追溯体系，增加和保障绿色农产品供给侧的价值与安全。加快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等“三品一标”名优产品认证，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知名品牌，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及品牌资产，进而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引发农产品供给侧安全的深层次原因，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是有效的解决路径。绿色农业应全面实行标准化生产及安全追溯，但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尚不健全，这是导致农产品供给侧安全问题的症结所在。按照《种子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等规定，加强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准入管理；制定农产品产地环境标准，全面开展农产品重点生产基地环境监测，对化肥、农药、兽药的使用量进行管控，净化农业生态环境；制定农产品流通标准，尤其加快国家强制性冷链标准的制定，完善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系统，拓宽条形码、二维码等可追溯标签的使用范围，提高农产品安全溯源及召回能力；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政府监管，加大对农户不规范生产行为的处罚力度，对采用循环方式生产、限额使用农药和化肥的农户给予财政补贴。

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逐渐成为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央行还坚守着秘而不宣、语焉不详的货币政策风格。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以新西兰、英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为代表的国家央行开始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越来越多国家的货币当局开始采纳这一制度，同时还采取其他的措施提升政策透明度。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的央行通过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来引导公众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政策透明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提高政策透明度逐渐成为一种政策趋势。

我国对透明度建设越来越重视。自人民银行从商业银行体系中分离出来后就不断采取措施提升政策透明度。随着2002年我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我国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设不断加快。2015年我国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该标准是GDDS的升级版。从加入GDDS到加入SDDS，中国信息披露的标准在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货币透明度提升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水平在不断提升，但是改善的空间仍然很大。货币政策目标不够明确。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对货币政策目标有清晰的界定，但是实际操作中往往要兼顾很多目标，例如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推动就业、扩大储备、稳定汇率等。货币政策委员会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虽然我国在1997年就建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但是由于目前还不具备决策职能，仅仅是议事咨询机构，这就决定了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议对公众预期的引导是缺乏效力的。另外，由于决议过程不够明确、定期会议的频率不高，因而缺乏对公众的引导。最后，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很多都是政府官员，专家和业界人员数量偏少，这也使其发挥科学决策和咨询的作用受到限制。信息披露的水平有待提升。我国货币政策的信息披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DS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首先，我国对外公布数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有待提高。人民银行侧重于对政策目标、金融数据等的披露，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过程、政策走势、利率走势、预测模型等方面的披露并不充分，做法较为谨慎。其次，央行公布的预测和决策信息经常使用比较原则性和官方性的措辞，公众不易从这些公告或新闻发布会中准确领悟到央行的政策意图，从而对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做出正确的判断。

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的路径

为了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透明度在引导公众预期、减少经济波动、提升政策效果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提高沟通的水平和质量。首先，货币当局在与公众进行交流时要向公众传达清晰、必要的信息，避免发布虚假信息或者误导信息对市场情绪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对于常规性货币政策信息披露要建立规则，逐步使信息披露标准化、规范化。对于非常规政策措施，在进行披露的同时要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安抚市场情绪。其次，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央行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应当成为常态。信息披露过程中要把握好时机，尽量减少信息披露的负面影响。最后，在发布政策措施前，应当仔细评估该政策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以及市场参与者的可能反应，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减少公众对冲操作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抵消。

提升货币政策独立性。由于货币政策独立性较低，信息披露所传达的信息可信性差，政策沟通的效果是大打折扣的。为此，央行应采取措施提升政策独立性水平。首先，明确货币政策目标的偏好。针对目前货币政策目标过多、目标偏好不明确现状。央行不但要从法律上确定目标偏好，在实际操作中也要坚持既定目标，提高政策的可信性。其次，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效力。公众对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关注度很小，主要是因为货币政策委员是议事咨询机构，缺少政策建议和政策决策能力。因此，应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效力，真正发挥政策委员会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提高货币政策可信度。只有货币当局的可信度非常高，货币政策披露的信息才会对市场参与者产生较好的预期引导作用，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效果。首先，央行应该充分考虑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对于未来的政策决定应尽量做出有条件的、相对短期的承诺。因为承诺的时期越长，在此期间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大，实际兑现的可能性就越低。其次，央行必须向公众充分说明货币政策决策的复杂性。货币政策环境在不断变化，货币政策决策也要随之进行调整。央行在作出货币政策承诺前必须向公众说明，这种承诺存在着发生变动的风险和可能。一旦政策出现调整的时候，能够更容易得到市场参与者的理解和支持。最后，央行要重视对政策承诺的履行，行胜于言，这对于提升政策可信度更为关键。

辩证看待透明度的作用。货币政策透明度对宏观经济和政策效果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作用。在沟通程度方面，央行要适可而止。货币政策透明度在稳定预期、减少波动方面的确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提升政策透明度也要付出很多成本，包括信息披露中耗费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提升政策透明度时应该把握好度，一味无限制地要求提升透明度水平不但符合工作实际，也违反了成本收益的基本原则。在沟通内容方面，央行应因时而异。当中央银行信息的相对准确度较高时，中央银行应该采取较为透明的货币政策，确保经济主体及时准确接收政策信息。而当中央银行掌握的信息精确度不高，同时市场参与主体又存在较高的“羊群效应”时，央行此时的最佳策略是保持适度的隐私，以免造成市场主体的过度反应。

以货币政策透明度引导公众预期

□卜振兴

宏观观察